

## 第一章 结束战争的漫长道路

### 警报声中的“四方拜”

人们迎来了太平洋战争第四年的元旦，这是注定战争失败命运的一年的开端。同样，天皇也迎来了这一天。根据当时的侍从长——海军大将藤田尚德的回忆和其他侍从的口述补充，那一天是这样的。

在宫中有历代相传的祭祀活动。元旦的祭祀活动是非常庄重的“四方拜”（拜神）。藤田侍从长凌晨5点之前就把车停在文库前等待天皇。在“灯火管制”下，皇宫一片寂静。凌晨，天气更加冷起来。温度计标着零度。

昨夜，11点50分有空袭警报。天皇就躲到地下室。零点半，警报解除。天皇只稍稍打了一个盹，4点20分就又起来了，在大元帅的陆军军服上戴上大勋位的副章。若是往常，天皇接着就去皇宫内殿神社院内的绫绮殿，换上只有天皇才能穿的黄栌染御袍，坐在神嘉殿前院用金屏风围绕的御座上，进行“四方拜”。可是天皇刚要出门，4点50分，警报又响了，同时，探照灯划破了夜幕，在空中闪烁。“有警报，请稍候……。”侍从长报告。天皇好象在默默沉思。可是，如果这样等下去，不多久天就会亮的，天亮后再进行“四方拜”是以前不曾有过的事。天皇有些着急，于是，侍从们商量，决定马上让皇宫中的服务人员，在文库南侧的院子里铺上白布和草叶席子，在上面又加铺了一个榻榻米，围上六折八扇的金屏风作为拜神的场地。天皇还来不及换上御袍，穿着军装就进了金屏风里。

“四方拜”的仪式，就是遥拜伊势神宫(龙宫)以及天地、四方诸神和皇陵，驱除一年的灾难，祈祷国家昌盛，皇室安泰。可实际上，这是只有天皇一个人来做的拜神，连侍从长也没有看到过金屏风中陛下的姿态。若是往常，在神嘉殿的前院，燃起篝火，看上去愈加神秘，可是此时却一片黑暗，只能听到陛下在榻榻米上滑动的“嚓嚓声”和军装配饰发出的轻微的金属声音。侍从长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四方拜”。陛下向诸神祈祷什么呢？当然无从知道。不过，既然很多的国民在空袭的间隙朝拜神庙，祈祷战争早点结束，那么从前后的事态看，天皇下了决心结束战争，这是非常明显的。决定战争命运的一年，就这样开始了。

## 天皇和隐避所

在讲述了天皇和防空壕1945年元旦非常特别的“四方拜”之后，藤田侍从长接着回忆了天皇在空袭下的情况。“陛下是恐怖感非常淡薄的人，按他的话说‘生死由命’，一点儿也不把内心的恐怖暴露给别人。空袭猛烈时，侍从中也有人浑身颤抖，可是陛下和往常一样，举止镇静，一点也不慌乱。”

1945年2月25日下午2点，在大雪纷飞中，130架B29型飞机从市中心开始轰炸，殃及四周沿街居民区。特别是集中在神田周围的6000发炸弹和燃烧弹，象雨点般倾泻下来。最后伊势神宫和宫内厅主马寮附近也遭到了轰炸。轰隆——轰隆——象是要摇撼整个宫城。陛下即使在那样非常的时刻，也是在警报响起10分钟后才进入防空壕。侍从们很担心，希望侍从长严厉地劝告天皇。因为是合乎情理的事情，侍从长就向天皇进谏。“我知道了。”天皇回答道。可是，侍从长劝告后，天皇仍不肯快点躲避，无可奈何，只好请容易向天皇进言的甘露寺受长氏向天皇直言。“陛下，不要让大家担心了。”虽然他是侍从次长，可他是大正天皇的学友，

并且是在侍从中侍奉天皇时间最长的人，具有侍从元老资格，在宫中被称为“工作自由”，他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当时，陛下搪塞道：“嗯，是皇后做准备耽误了时间。”“皇后也应快走嘛，警报一响，皇后赤身裸体地跑去也是很正常的嘛。”换了别人，在天皇面前是不能开这样的玩笑的。皇后也笑了，轻声应道：“是，照你说的做。”

这样一来，陛下的行动加快了一点，可是侍从长还是担心，建议在文库和防空壕之间挖个地道。建议被通过了，可是动工的命令始终没有下达，侍从长一再催促。天皇说：“虽然答应了此事，可如果在皇宫御所(伊势神宫)挖地道，宫中三殿、内殿会怎样呢？”天皇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当他知道了伊势神宫的地道挖成后，内殿的神器搬到地道内是很安全的，才答应动工。

这个工程，由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壹大将亲自指挥。用铁路钢轨搭成架子，再用水泥加固。在施工过程中，高空一架B29飞机不紧不慢地进行空中拍照。

言归正传，1945年的天皇，用平常的话来说，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是完全成熟的年龄了。弹雨“轰轰”地摇撼着宫城，在他心里只能听到国民的呻吟之声。这一年的1月6日，离他穿着军装进行“四方拜”的日子仅5天，天皇把长期郁积在心的不快流露给了木户内大臣。“我想听一听各位大臣对时局的看法。”他的话大意是这样。

当时，在天皇和人民之间有一道厚厚的屏障，他曾一度解散内阁，即使重臣(下野的首相)也不能很容易地接近天皇。换言之，天皇也和国民一样，只能听到虚报的战果，不知道真实的战局，天皇决心由自己来打破这道屏障。

### 对军方的不信任

翻开《木户日记》，(内大臣木户幸一的详细记录)1945年1月

6日的记载：“从下午2点25分到3点5分，在文库谒见陛下，当时进行了下述谈话：据报告：美军企图在吕宋岛登陆，入侵仁牙因湾。菲律宾的战局越来越紧张了。结果会怎样？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向重臣们询问他们的看法了。对此，我大略做了如下的回答：（摘要）您说得对，我们要根据菲律宾的战况如何，来决定如何指挥战争。首先，要看以后的事态发展，还要先听一听陆、海两总长（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的真实意图，这样如何？以前，即使会见也是流于形式。这次为了真诚、坦率地交谈，要同时召见两总长，你看怎样呢？并且，还要召见有关阁僚大臣，仅就所能够同意的方面进行磋商。在确定最高方针的决定性纲领时，最好根据情况召开御前会议。不管怎样，也要看数日后的事态发展再作决定。

3点半回家，4点半去冈田家吊唁。冈田启介大将的长子贞外茂是军令部参谋，上个月26日在菲律宾战死。

在两天前的4日早上，小矶国昭首相晋谒天皇，向陛下报告了政局和战况。那时，陛下问：你一直以皇军在菲律宾的莱特决战来教育国民，可是，现在决战移向了吕宋岛，那样大肆宣扬在莱特的决战，如果国民知道了在莱特的决战并不顺利，他们就会失望，影响士气，这不是给增加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吗？对此，你有什么对策？小矶首相今早了解实际情况后，也吃了一惊。他回答道，目前正在制定指导国民的方针。由于首相心有余悸，他只能心中无底地这样说。首相惊恐是因为他明白再强硬的军队也无法挽回战局。他考虑的是在哪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掌握媾和的契机。并且选择莱特决战来给敌人沉重的一击，极力宣称莱特决战是胜败的关键。结果不仅没能取胜，反而彻底失败了。这一天，即4日，我们的侦察机发现莱特失守。现在敌人庞大的运输船队正在北上，向吕宋岛的仁牙因湾挺进。首相所害怕的也正是这件事。首相余悸未消，所以陛下也很担心。之所以说想会见重臣，是因为已经不能再相信军人说的话了。”

这段谈话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开战以来，关于政治方面的事情，陛下除了允许木户内大臣拜谒之外，只有东条英机、小矶国昭二任首相和陆海军负责人以及阁僚能够面见。陛下没说要会见重臣之前，身边一直都是这些人。

说到重臣，这是一个前任首相的集团。当时指的是平沼骐一郎男爵、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广田弘毅、近卫文磨公爵、若槻礼次郎男爵、米内光政海军大将、阿部信行陆军大将以及前首相东条英机陆军大将。宪兵队很清楚大部分重臣都在想什么。去年7月18日，他们之中的冈田、近卫、平沼、若槻、米内等曾秘密商量，决定把开战以来一直指挥战争的东条内阁逼入总辞职的困境。单从这一事件来看，也是很明白的。这并不是说东条没有继续指挥战争的能力，而是为了终止战争，才迫使东条辞职的。这是和平论者的主张，他们被认为是国贼，继续受宪兵队的监视。

陛下说想会见重臣，木户内府也不得不慎重行事，就这样，过了整整一周的时间。

再根据《木户日记》：“1月13日，晴。从10点35分到11点5分，在文库晋谒天皇。讨论有关菲律宾的战况，以及敌人机动部队在法属印度支那沿岸登陆炮击等等。并重申要认真考虑重臣们的意见。陛下就催促尽快会见重臣。”

### 对战局的预测

木户内府的回答是要认真考虑重臣们的意见。可是过了不多久，发生了下面的事情。

1月30日，近卫突然采访木户内府，报告了自己和平沼、若槻、冈田(这四个人每月相聚一次)商量的结果，认为这时特别有必要弄清陆、海两总长的真实意图，希望内府尽力。这件事在《木户日记》中也写得很清楚。至此，木户内府终于挺起身来，但不是

召集所有的重臣一起，而是让他们一个一个地晋谒天皇。木户内府的这种态度遭到了指责。

铃木终战内阁情报局总裁下村宏评论道：“木户内府没经过深思熟虑就召集重臣，在政府的人事工作上，越权过问份外的事，这加深了陛下和周围人的隔阂。”

侍从长藤田尚德的回忆说：“木户内府认为自己仍是贵族，按照当时的习惯，总认为是受人尊敬的‘侯爵’，这反映在木户内府的性格和作为内务大臣在宫中的工作上。因此招来了诽谤，说他在陛下周围制造隔阂，不让自由地晋见天皇。”

的确，维新元勋木户孝允的孙子，经学习院、京大进入了农商务省。两年后父亲去世，他继承爵位，成为世袭的贵族院议员，担任商工省（1925年从农商务省中分离出来）临时产业合理局第一、第二部长。遭到了那些虽是贵族院议员，而没有占居省工商显赫职位的同僚们的嫉妒。据说，木户进入宫庭是1930年10月，在他和近卫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近卫无意中说：“把你推荐为内大臣秘书官长。”1937年6月第一次成为近卫内阁的文相（文部大臣），后来，并任厚相（厚生省大臣），接着，担任平沼内阁的内相，1940年6月，成为因病辞职的汤浅仓平之后的内大臣。他的确是贵族，也年轻，1945年时才55岁。

在这里顺便对皇宫职务的分担进行说明。所谓“宫内大臣”就是管理宫内省（与内阁省相对独立）的行政官员。现在的宫内厅附属总理府，职员有1000人左右。而当时有6000人左右，管理皇室林野局、皇室博物馆和皇家财产。

侍从长管理政治方面之外的天皇的私事和公事。内大臣（现在取消）是在政治方面与天皇商讨的官员。总理和阁僚想晋谒天皇也要通过内大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处于可以控制晋见天皇的政治渠道的地位。因此，在这方面偏见很多，认为：因为有内府，所以向天皇说的话总要拐个弯，这也是事实。可是，木户内府处于这样的地位，并且又任职多年，所以他最了解天皇的心情

和想法。

在《木户日记》和“有关日记的记录”中写着，木户内府最初知道天皇内心倾向和平的想法是1943年3月30日这一天，天皇说：“这场战争的前途并不光明，要补充在中途岛失去的军舰和飞机是很困难的。如果没有制空权，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到处是破绽。”木户内府从一开始就是“悲观的”，可是由于能揣测出天皇的想法，就未曾涉及到这个问题。现在陛下问到他，他就申述自己的想法。他回答说：“最好是抓住有利时机结束战争”。陛下说：“如果能那样，就好了呀！”

天皇说出这句话后，人们就可以自由地谈论和平问题了。可是，木户内府并不向外透露议和问题。当时的内大臣秘书官长松平康昌在东京审判时，交待出如下的供状：“那时（1945年2月），木户内府说：‘会见那些重臣，我和天皇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重臣）被公认为是和平论者。如果我这内大臣会见他们，就会被认为我与和平运动有了联系。进一步说，天皇也和这有了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公开化，军方不会沉默，和平运动就会受挫。‘即使人们认为木户是强硬论者，过不了多久就没关系了，到时人们会明白的。’木户内府为了和平运动，内心苦思焦虑，可又不能向外流露出什么态度，我为此深为感动。”

陛下说想会见重臣，过了没多久木户内府就让他们一个一个地，而不是一起晋谒天皇，这是出于对军方的担心。平沼骥一郎男爵在2月7日是第一个晋谒天皇的重臣。

### 没有实现和平的具体策略

开战以来第一个晋见天皇的重臣平沼骥一郎男爵，是从2月7日开始的。谈了些什么，只有侍从长藤田尚德海军大将一个人侍立一旁，听到了那次谈话，写在他的《回忆录》里。

按照宫廷职务分工，本来木户内府也有理由侍立天皇左右，

出于对军方的顾虑，他安排了只是重臣向陛下问安的拜谒仪式。

“天皇和重臣交谈时，只有我侍从长一人侍立一旁。在第二期厅舍拜谒室，重臣隔着一张小桌子坐在陛下的对面。我在陛下左后方一米处，把交谈的要点记录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当时只能听到铅笔的声音。这个记录写好誊清，亲手交给了木户内府，我想木户把这放在了小手提包里保存。战后，在追查战犯非常紧要时，木户委托我说：‘请你保管好这个手提包。’可是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好象是木户拿去了。我在这里追忆，想弄清这次拜见时的全部内容。”

可是，遗憾的是，在平沼男爵的谈话中，有关结束战争的具体策略一点儿也没涉及。侍从长讲：“我好象听有汉文书籍讲解的感觉，陛下也始终默默地听着。”平沼的陈述主要有两点，即把战争政策的施行作为重点，重视官员对国民的仁爱。在那个时候，这也许是很重要的。不过，这和陛下所寻求的目的离得太远了。现在年轻的读者读到这里，也许会想，“所谓重臣是什么？难道就是这样的吗？”从历史上看，就是那样的。

藤田侍从长的回忆继续写道：“过了一天，9日，外交界的元老广田弘毅来晋谒，广田上奏的概要如下：‘我认为日本、欧美都在长年的战争中消耗很大，战争局势正在接近尾声。虽然我也正在考虑今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可是实际上，很多人对此都没有明确的估计。在战局上，难道没有减轻日本的困难，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的办法吗？基于这一点考虑，现在应特别重视和日本没有战争关系的俄国，不是很重要的吗？’

在对苏政策方面，从前年以来，一有机会就提醒政府。小矶内阁成立后，也说过：如果让我亲自去俄国，广田是表示愿意去的。可是，不受对方欢迎的访问是不会取得成果的，因此，探清了对方的意向。现在给予国内外的影响还不能令人满意，我的访苏，时至今日，仍没落实。我认为《日苏中立条约》虽然能顺利延续到今日，可是随着战局对俄国的有利发展（4天前，苏军越过奥



得塞河，进入德国。)它要采取自由立场的想法会更强烈。它要抓住这个有利机会，收复过去失地，着手改变国内的羸弱。其手段就是利用英美的物资作为代价，倒向英美一方。当然，就会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

去年的斯大林演说(斯大林在194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日苏中立条约》签定前，对日本的行动没有涉及。可是，今天，声明日本和德国是一样的侵略国，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碰巧，这一天也是美国总统选举日，有人解释成是助威演说。)被人们认为是为了保持苏联和英美的协调，但是，我认为其用意也是针对日本的。松冈外相缔结的《日苏中立条约》的有效期，再过两个月，即4月25日就到期了。我确信，现在作为政府，是应该采取什么手段的时候了。”

大内山的森林，保持着空袭下的东京令人难以想象的寂静。可是，从广田进谏五天前开始，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就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聚会。

现在的办法是什么？

广田弘毅的上奏和平沼骥一郎男爵“好象听汉文讲解”的上奏相比较，是具体的。不管怎样，平沼、广田都是在现代年轻人中有声望的人。

平沼在1945年是78岁，正是松鹤遐龄，他作为司法界的一根顶梁柱，从检察总长、司法大臣、大审院长到枢密院，后来成为议长，第一次成为继近卫内阁之后的总理。他在职的8个月中，面对出人意料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留下了“扑朔迷离”的名句而辞职了。如果认为“扑朔迷离”就是不能掌握世界形势变化的自白，那么在过了一年之后这样严重的战局下，也许他仍然不能掌握世界形势。

广田比平沼男爵年轻11岁，外交官出身，曾担任驻苏大使，

二·二六事件以后，继冈田内阁之后接受天皇的命令，曾先后四次担任外相。可是在执政上，受军方的强制，与德国缔结了日本外交史上的《日德防共协定》，使日本加入轴心国。可是他认为，战局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只有依靠苏联来斡旋求得和平，这也是当时外务省的想法。现在，继续平心静气地看广田在天皇陛下面前是如何上奏的。

《日苏中立条约》的有效期限还有两个多月，即4月25日，到了政府应该采取什么办法的时候了。“昨天也和外务省谈了，可以认为他们的意向也是通过左藤尚武(驻苏)大使，进一步洽谈中立条约的延续。特别是如果把现在的德国战局和开罗的三巨头会议放在一起考虑，我认为现在正是有必要明确日本对苏联态度的时候了。”

开罗会议就是1943年11月22日(26日、27日发表开罗宣言)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在开罗聚会，明确了最初的对日方针。这三个同盟国只是对日本无条件投降施加军事压力，对日本领土还没有野心，可是，让归还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南洋诸岛，把甲午战争、中日战争中“日本从满清手中掠夺的满洲、台湾、澎湖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并且，开罗宣言的第二天，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在德黑兰会晤。德黑兰会议结成了对德的第二条战线，即“用最长的时间”讨论了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实际上，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同意了如果德国投降，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可是，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进入满洲之前，日本人谁都不知道这件事。并且在德黑兰会谈后，在另一次的同盟国巨头会议上，即从1945年2月4日到11日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更加具体化。

这次会谈协商了战后对德国的处理方法，对被解放各国的处理等。秘密协定中还有如下内容：德国投降二、三个月以内，苏联对日宣战，其补偿是，苏联获得库页岛的南半部分；取得千岛的领土主权；租借旅顺；优先使用国际化的大连港；优先使用中

苏合办的中东铁路和南满洲铁路。

这个秘密协定不但日本，连关键所在的中国也不知道。据说，罗斯福宣称：“如果让中国知道了，24小时之内，整个世界就都知道了。”回过头再看，广田上奏的2月9日，正是雅尔塔会议召开之际，并且对日秘密协定的签订，正是广田上奏的第二天，即10日，应该说历史真是无情啊！

继续看广田的上奏：“有人推测，按现在这种状况，《日苏中立条约》能够延续，可是没有保证。但并不是说苏联现在立即站在英美一方，对日本采取敌对行动。即使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也会给条约的延续设置障碍，使日本陷入不利境地。

一方面，英美的态度在战争局势上的反映是强硬的，四次连任总统的罗斯福想在自己的任期中结束这场战争，这一届的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祖父尤达雅是德国人，副国务卿格鲁是众所周知的多年驻日大使。把熟悉德国、日本的人物放在关键的职位上，我认为是出于尽快结束战争的考虑，可是，今后我们的战果会是怎样呢？可以认为国民充满了奋起为国殉难的气概，政府也正在考虑为激发其影响的施政方针。”

广田上奏就这样结束了，天皇注视着广田说：“现在外交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

## 国际形势的变化

接受天皇询问的重臣广田弘毅把视线停留在陛下面前的小桌子上，沉思之后说：“无论对中国采取什么政策，蒋介石也是无力回天的。”军方在占领下的南京建立了与重庆蒋政权相对立的汪精卫政府，随着汪在1944年11月病死在名古屋的帝大医院，也已经无路可走了。

“对苏谈判如何进行呢？”天皇问。

“对于苏联，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也要采取新的立场，如果苏

联不欢迎日本新的使节，我想可以进行更换大使的谈判。我想现在的佐藤尚武大使在英、俄的知己很多，如果把瑞士交给他，让他自由地运用外交手腕，接触同盟国的要员，就会有起色的。佐藤大使在苏三年，虽然很努力，可是到了现在也正是难以施展本领的时候。外相建议派新大使，在新的立场上行动，这样对日本有利。

在这里，如果不加注释，年轻人就不会明白，战争发生后，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人可以专心于战争的完成，剩下的一百人或五十人就必须考虑有关战争结束的问题。”这是原外相有田八郎写的回忆录《人眼看实世》序中的一节。

再引用一句话，就是原驻美大使来栖三郎著的《沉浮的三十五年》写道：所谓军队就是匿名组合，说服军队就象要逮一千只猴子，匿名组合不知道负责人，一千只猴子，有的听话、有的不听话，全部逮住是不可能的。

可是，到了1944年，在大约一百个和平论者当中，有田是最愤慨和最有影响的。发展到了这种局面，陆军也第一次谈论和平论和结束战争的工作。在1944年9月5日第十一次军事会议上，杉山元陆相要求特别发言，他叙述了一、德苏和平工作；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三、对英美和平工作的构想。

苏联对德战争已损伤15,000,000人口，消耗是显著的。德国在东部战线也在后退，对苏继续作战很不利，所以德苏间和平是可能的。至于苏联，可以暗示日本也许刺其背后。

重庆也陷入了困境，如果让他与南京政府合流，也并非没有希望。英国在远东有很大的权益，并且亲日人士多，也能谈妥。和平工作虽然乐观，可是陆军特别迟钝。不过，“匿名组合”好象一千只猴子的陆军，也说出了这样的话。所以可以说和平论调活跃了，只是具体政策因人而异。

现在可以说，重臣广田在上奏中，仅限于对苏工作方面。外务省(重光葵外相)在对苏特派大使的人选中有意抛开广田，陆军

推举《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者松冈洋右。但是，由于小矶总理、松冈身体有病，所以采纳东久迩宫和绪方竹虎的意见，提出让平民出身、并与斯大林相识的原房之助担任。尽管内阁中围绕着人选问题有争执，可是无论如何，外相仍进行着向苏联派遣特派大使的工作；虽然德苏和平希望渺茫，可是外相仍希望苏联调解日本和英美的关系。驻苏大使佐藤根据外务省命令，1944年9月16日会见莫洛托夫外交人民委员。

这个情况，作为日苏谈判记录，保留在外务省。如果简单地写，莫洛托夫从刚刚回国不久的驻日大使马立克那里听说了日本要派特使的这件事。可是他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如果说现在从日本来特使，作为德苏间的调解人，世界各国是不会理解的，苏联也没有和希特勒和解的意思。”莫洛托夫说。佐藤大使说：“不只那些事情，也包括日苏间的问题。”莫洛托夫又说：“现在，日苏间有什么问题呢？马立克虽然年轻，可是你我都是老资格了，不需要特别大使。”

那时，莫洛托夫委员说：“正如希腊哲学家说的那样，我们笑的时候，宇宙就变化了。现在苏联政府考虑的，和我们今天自己所说的是一致的。”写出这样长的背景，就可以正确地理解广田上奏的意义了。

广田回答天皇的询问，声嘶力竭地说：“绝对不能和苏联再发生战争，如果腹背受敌，就会陷入跟德国一样悲惨的战局。”天皇赞成地点点头。广田把视线停留在小桌子上，等待着天皇是否还有询问。天皇表示感谢地说：“你辛苦了。”慢慢地站起来。房间里的紧张气氛消失了，身材短小的广田深深地磕拜，退了出来。

### 言辞激烈的近卫上奏

2月14日，重臣近卫文磨公爵第三个上奏。《木户日记》记载：“上午10点警报，近卫晋谒天皇，在文库拜见，藤田侍从长因患

感冒，我代他侍立。”

藤田侍从长的回忆写道：“这天早晨木户内府来到侍从长室，‘藤田，今天近卫晋谒天皇，想让我侍立一旁，近卫公爵对你不太熟悉，因此，很介意侍从长的侍立，如果事情办得不妥当，就只好说话了……’

这是让我回避，我很清楚。几天来陛下寻求和平的严肃态度，并且考虑到陛下和近卫、木户长期以来的亲密关系，我也就欣然答应了。”

再者，从1944年2月19日开始担任东条内阁的农商大臣内田信也氏在他的回忆录《风雪五十年》中，对近卫上奏前后的情况，叙述得更加详细。“2月9日上午10点，我在汤河原的近卫别墅拜访近卫时，内府秘书长官松平康昌氏给近卫来了电话，告诉他说：恢复中断了很久的重臣单独晋谒，以代替今年还没进行的贺年仪式。但考虑到各重臣的方便，决定每天接见一人。因此届时希望上奏对时局的看法。不过，重臣不是国务大臣，所以有人在一旁侍立，轮到近卫公晋见是2月14日，请好好准备。第二天（10日），我拜访冈田启介大将时，转达了这件事。

近卫公12日到达东京，来到平河町的吉田茂家，起草上奏文件。我想他一定需要有关粮食问题的材料，就在13日早上，叫来粮食管理局次长片柳真吉君，研究考查数据。那天晚上，我去吉田茂家将写好的材料交给近卫公，碰巧松平也在座，我反复和吉田君作了商谈。

14日是近卫公上奏的日子，他一点也不放在心上。下午3时左右，我到吉田家和吉田君一起等待着他的归来。4点左右，他微笑着回来了。他好象很满足地说：‘听说今天是没见过面的藤田侍从长侍立，所以有点顾虑，侥幸的是，藤田因病休息，木户侍立一旁，干脆开诚布公地说了个痛快。上奏延续了一个多小时，陛下也很热情地询问。’”

吉田茂在《回忆十年》中，记载着近卫公拿着上奏文件去吉田

家的事情。“……因为我完全赞成近卫公的意见，所以两个人努力补充校正上奏文。同时，我誊写了奏文，和近卫公谈到深夜。我想让牧野伯(牧野伸显，吉田茂的岳父)看一看抄件，近卫公也同意了”。

其它的重臣晋谒时，什么也不拿，即便拿，最多也是拿个笔记本。近卫公拿着自己写的奏章去，所以是很特别的了。不过，在内容上，内田氏所考虑的诸如财政问题和粮食问题一点也没涉及，其原文至今仍保存完好。

细川护贞的《细川日记》在1945年3月4日那一天写道：“上个月的2月28日，在这里抄写近卫公委托的奏章，这是为了让高松宫殿下看的。”

顺便提一下，当时近卫公很忧虑，天皇对战局的了解和报纸没有多大差别。他想让自己的女婿护贞收集情报，通过当海军的高松宫告诉给天皇。可是，那时除了可以和子女说话以及例行的茶会之外，好象有一道不能接近天皇的墙。在《细川日记》中，到处可以看到责备木户内府的语言。他被认为是制造了这种隔阂的人。

如此长篇大论地描述这件事，是因为当时的宫廷集团和贵族集团都想弄清这件事的真正原因和动向。

这些姑且不论，现在就是寻找重要的近卫奏章也要费点事。可是他在上奏数旬之后，宪兵队就把文稿搞到手了。结果，吉田茂被宪兵队拘留44天。请继续看近卫上奏的情况。

### 忧虑国内的共产革命

据说，近卫公来到天皇面前，照常规向天皇问了安。天皇问：“近卫也健康吗？”这是开战以来重臣的第一次上奏。近卫公大概也很郁闷吧，他把奏章认真地誊写在八张白纸上，拿了进来，现在只差在陛下面前打开了。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近卫上奏”的全文。当时对内容不清楚，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原文是文言体，比较难读，实际上，并不是按文言体的格式写的，在开头就开门见山地写道：“战败虽然遗憾，可是必然到来。”细川护贞纠正道：“然而近卫公毕竟是向陛下禀奏，不能说‘战败’，而应改成‘危机’。”这里我们把它变成通用的文体，不过仍保留着原文所具有的风格。

“战败虽然是令人遗憾的，可这是必然的结果。下面，只能在这个前提下向天皇禀奏。

战败是我们国体上的重大损失，英美的舆论界在此之前，还没有提到要变更日本的国体。当然也有过激论，并且将来怎样变化还很难预测。因此我认为，如果只是战败，没有必要对国体忧虑。

最应该忧虑的是战败，以及伴随战败发生的共产革命，他比维护国体更令人忧虑。经过仔细考虑，我认为，现在国内外的形势表明，正在向共产革命快速地发展着。在国外，苏联大肆扩张势力，我国国民的确还不理解苏联的意图。苏联采用1935年实行的人民阵线战术，也就是实行二次革命战术。特别是最近的第三国际解散以来，不重视赤化危险的倾向是很明显的，我认为这是简单肤浅的看法。苏联最终不会抛弃赤化世界的政策，从最近对欧洲各国的明目张胆地颠覆，可以看得很清楚。苏联为在欧洲的邻国建立苏维埃性质的政权而正进行着努力，可以看到大都成功了。南斯拉夫的铁托政权，是典型的苏维埃性质的政权；在波兰，以事先在苏联境内组成波兰爱国者联盟为中心，建立了新政权，亡命英国的前政权被抛弃。从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的停战条件上来看，苏联站在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要求解散希特勒支持下的团体，让实际上的苏维埃政权执政，就象要求解散法西斯政权一样强烈。由于伊朗不答应苏联所要求的石油权利，而强迫其内阁总辞职。

另一方面，英美占领下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在对德战争



中涌起的武装团体和政府之间的深刻矛盾仍在加深。这些国家都面临着政治上的严重危机，指挥这些武装团体的主要是共产主义者。对德国如同对待波兰一样，企图以事先策划的自由德国委员会为中心建立新政权，这对于英美来说，正是使他们伤脑筋的原因。

苏联对待东亚的政策也是同样的，目前在延安组织了从莫斯科来的冈野(即野坂参三)为中心的日本解放联盟，联合朝鲜的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和台湾先锋队向日本呼吁。我认为，苏联不久很可能要干涉日本的内政。

就象要求戴高乐和巴特里奥政府那样，要求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共产党人入阁，废除治安维持法和防共协定。”

当时以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形势的确朝着那样的方向发展着。在这方面应该说近卫公是有先知卓见的。这跟广田上奏相比，显出很大的不同，广田上奏在外交上，有关事务性的对苏态度是冷静的，而近卫上奏的对苏态度是急躁的。

近卫观察到国内出现了歇斯底里的赤化恐怖感。这一天，在日本本土，一架B29型飞机袭击了东京和大阪，这让人不得不再次想起1945年2月14日的事情。

### 贵族、近卫的悔恨

“回过头来看我们国内，感到完成共产革命的条件日趋成熟。也就是说，由于生活的贫穷，工人们的发言权大大加强了，他们对英美更加仇视；在另一方面，对苏联开始密切起来。左翼分子在幕后策划军部内部的革新运动，还伺机进行了所谓的新官僚运动。

最应该担忧的是军部内部的革新运动。就象多数少壮军人坚信我们的国体和共产主义是并存的一样，军队内革新派的论调也在这里流传，在皇族中也有人倾向这种主张。大部分职业军人的

出身都在中层以下，很多人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

最初发生的满洲事变、中国事变以及最后发展成的大东亚战争，这些都是军方有预谋的计划，现在也是非常清楚的事实。满洲事变时，他们公开说事变的目的是为了国内的改革。中国事变时，这一伙中心人物公开声称：‘事变可以退出，如果不解决事变，国内的改革是不能进行的’。军方改革的目标未必不是共产革命，围绕在军方周围的一部分官僚，以及民间的有志之士，都隐藏着要把他们拉向共产革命的意图。认为无知单纯的军人不会策动共产革命，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从这件事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十年间，在军部、官僚、右翼、左翼各方面广交朋友的近卫，最近也坐下来冷静地反省着，以此为借鉴，回顾一下过去十年间的活动，确是会有许多感触。近卫在这期间，三次接受天皇的命令组建内阁。为了避免国内的矛盾摩擦，他尽可能地采用这些改革派的主张。他担忧不能实现全国一体化，结果没有识破隐藏在他们背后的意图。他不明内情，觉得实在对不起天皇，深深痛感到自己有责任。在陛下面前，近卫低低地垂下了头。大概他今生今世，还没有过象现在这样自责没有完成辅助天皇的重任。

如果不了解他本人的政治阅历，就不会理解这些。近卫公也是典型的贵族，可是多少有点与众不同。他在第一高等学校、东大、京大读书，是因为想听河上肇教授讲课，他也在学习当时青年最新型的社会思想。可是他父亲去世以后，世袭贵族院议员，40岁就当上副议长。这时，他写了《反对以英美为中心的和平主义》一文，提倡“世界有富裕的国家和不富裕的国家，但世界政治应该遵循国际正义原则。”

满洲事变前后，他通过森恪和军队中的骨干将校交往。“五·一五”事变以后，民众的不满情绪激化，在此期间，他抱着“让那·达赫克”的期待，几次推辞令人仰望的总理职位。可是，“二·二六”事件以后，广田、林銑十郎组成的短命内阁解散以后，近卫终

于在1937年6月4日接着组织内阁，当时46岁。

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与运用军事力量相反，他主张实行不扩大的方针，甚至皇军攻入南京时他还利用驻日的德国大使狄克逊进行和平谈判，结果失败，只有扩大战争的一条道路。日军进入广东、武汉时，他提出“大东亚新秩序”的政治理想，宣扬“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接受三原则的汪精卫，从蒋介石政权分离出来，在短期内看上去很顺利，可这也是徒劳的。结果承担了中日战争长期化的责任而辞职，之后，他担任枢密院议长。1939年9月，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近卫开始推动新体制运动，他认为应该建立能够控制国内动荡局势的强有力的政治体制。1940年7月第二次组阁，在国内建立了大政翼赞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对外缔结了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

这时日美关系每况愈下，近卫为了扭转这种情况，1941年4月开始日美谈判。可是，他没能完全控制乘机兴起的军方及官僚的强硬派。为了免除松冈洋右外相的职务，近卫内阁一度总辞职。不过不久组建的第三届内阁，继续进行日美谈判。可是美国的一个条件是要日本从占领的中国撤兵。围绕着这一问题和东条陆相发生激烈的冲突，最后只好再次放弃政权。后来的东条内阁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虽然有人说东条“与其志向不同，”可是从近卫的政治阅历，除可以看到他的特殊之处，结果是，客观上决定了由他本人开辟军事法西斯化的道路。他的悔恨、反省、一切政治挫折，都凝聚在这篇短短的上奏文中。

### 用和平维持国体

在近卫奏章的后一部分，他认为事态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是由于近卫自己不明内情，深感抱歉和负有责任。可是如今怎么

办好呢？

“昨天和今天战局再度告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叫嚣更加猖狂。之所以有如此的主张，我认为这是由于右翼分子从幕后扇动，以此在国内制造更大的混乱，最终使共产分子达到革命的目的。

在另一方面，在高喊彻底击败英美的同时，亲苏的倾向更加明显。军部的一部分人认为，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争取和苏联以及延安(中国共产党)互相提携。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外共产革命所需的一切条件，正在日趋成熟，今后如果战局继续恶化，这种形势还会加速发展。就战局的前途来看，如果在任何一方能打开局面，那当然另当别论。不过，在战争必然失败的情形下，继续进行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只能给共产党提供机会，因此，为了维护国体，必须谋求结束战争的道路。

结束战争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军部。他们在满洲事变以来，一直控制着局势，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可他们还有一股力量。他们虽然丧失了战争胜利的信心，但从现象来看，他们还想抵抗到底。再者，在扫除这股军部势力，采取尽早结束战争的措施时，右翼、左翼的民间人士会在国内制造大混乱，这样来影响军方。因此，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时，关键的是把这些势力扫除干净。只要扫除了这些势力，官僚中的投机分子以及左翼、右翼的分子，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况且他们还没有形成很大的势力，只是想利用军部来实现他们的野心，因此要斩草除根。

再者，这样想来也是很有希望的。如果扫除了这些势力，那时，军部的面貌完全改变了，英美以及重庆，也许会出现缓和的气氛。

本来，英、美和重庆的目标就是要打倒日本军阀，如果军队的性质改变了，他们的政策也会改变，况且他们也不想再继续战争。无论如何，肃清这股势力，重建军部是把日本从共产革命中拯救出来的前提和条件。因此，希望陛下拿出非常的勇气决断。”

以上我们引用的《近卫奏章》中，前一部分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分析，中间部分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他把军人推断成共产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本人难以赞同。我甚至怀疑贵族是否都认为穷人才是共产主义者呢？象近卫在陛下面前自白的那样，他作为政治经历复杂的人，一直和军人、官僚、左翼、右翼交往，其中不乏有各种目的的投机者。这十年中的历程，使他特别惧怕共产主义。可是，若是在上奏的前一年，即1944年11月，这种论点也许会遭到攻击。

近卫身边的智囊团西园寺公一和犬养健、吉田茂都是出身高贵的人。其中一位是新闻记者出身，并不高贵，只是近卫智囊团中的一名小卒尾崎秀实，受到了严惩，这是宪兵采用的手段，以警告重臣。当时，有人认为那是近卫公自己设的圈套。

即使这样，近卫公也是对共产主义深深恐惧的，因此，细细推敲他对于军部多年郁积的愤恨，也包含着私怨，所以才断定军人就是共产主义者。

近卫奏章的后一部分，对于在这样严重的战局下，采取何种策略，其回答没有任何具体的对策，只是说必须肃正军方。

当时近卫的上奏是绝密的，因此，人们给予深切的关注。不仅现在的读者看后会很吃惊，就是在当时，如果公开发表，人们也会大吃一惊。

最先吃惊的正是接受上奏的陛下自己，他立即提出质问。

整军，整谁呢？

天皇的质问和近卫的回答，被当时上奏时侍立一旁的木户内府记录了下来，交给了藤田侍从长。在藤田侍从长的回忆录中，虽然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记录着当时的情景，可这仍只是传闻。虽然客观上想把记录保密，但从当时的气氛来看是不可能的。

近卫公激烈的上奏结束之后，陛下马上问他：“依你看好象

美国不想变更我们的国体，可是梅津参谋总长推测，美国正在考虑变更日本的国体，这和你的想法不一样，对此你有何感想？”

近卫回答道：“军部为了激发国民的战斗意志，很会表现自己。我坚信格鲁次官（当时美国的副国务卿）并不支持左翼。格鲁在辞去驻日大使职务归国时，对于秩父宫大使夫妇的态度从措词上来看，对我们皇室还是十分尊重和了解的。”

“不过，美国是一个舆论自由的国家，还不能断言将来也不会发生变化，这要取决于今后的战况如何。从这一点来看，谋求结束战争的对策，也是至关重要的。”

陛下接着问：“刚才你说整顿军队是重要的，可是整军的目的是什么呢？”近卫说：“首先是思想，把这个作为目的。”陛下问：“整军的问题会涉及到人事问题，你是怎么想的呢？”近卫含糊地说：“那是陛下要考虑的。”陛下立即问道：“难道你不知道这非常难吗？”

人们在一般的情况下向上级汇报时，都通过朋友或同事转告，而不是直接进行。这种有些夸张的空谈，总是期待着上级的采纳，而后作出明断。

如果说可以称为重臣的近卫公也是人，而且是贵族，他的态度也是很高傲的。陛下一针见血地问他：“结果不会涉及到人事的问题吗？你所说的那一伙人究竟指谁呢？”

陛下虽然是头脑很灵活的人，可是反过来说，他并不是想套出别人心里话的坏人。这一切都是出于陛下真实的心境，自然而然地问起的，不能认为是心怀叵测的。

“他们是谁？”近卫公也不能直说，只能隐藏在心里。近卫再三考虑后，慎重地回答：“军队长期以来是靠这种思想统治着，不过也常常有持反对意见的人。我认为请这些人来整顿军队是一种对策。这些人包括宇垣（一成）、香椎（浩平）、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石原（莞尔）。不过启用这些人会使矛盾激化。根据推测，一旦发现产生了摩擦，就马上采取断然措施。如果考虑大

敌当前，采取果敢行动会有危险，就启用阿南(惟几)、山下(奉文)两大将。前几天和平昭、冈田也谈到了这件事。贺阳宫认为，重建军队，山下大将是最合适的人选。”

无庸讳言，现在的读者听到了这些人的名字，一下子明白不了这是怎么回事。军阀的派系分为以山县有朋建立的长州军阀，和西乡隆盛建立的萨摩军阀。他们在明治、大正、昭和几代一直存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长州军阀中发生了分化，其中一派被称为“统制派”，这主要是参谋本部制造的。他们的用意，一方面是控制随着军队指挥系统的复杂化而带来的混乱；另一方面，现代战争是总体战，一旦有战争，在统制经济下重新组织日本经济，也就是说把日本的政治、经济完全置于军队的控制之下。支配这个统制派的首要人物，就是东条英机大将。

萨摩军阀多是野战军团长，他们是在天皇控制下组织起来的军队，被认为是天皇的军队。因此，在考虑具体对策时，把重点放在反对共产主义和对苏作战，可以说昭和史一直这样发展着。随着军事力量的兴起，一般的政治家或倾向于皇道派或是统制派。近卫公偏袒皇道派，木户内府从其出身出发偏袒统制派。由于木户内府侍立一旁，近卫公上奏的口气比较婉转，也是可以理解的。

近卫公这时提到的宇垣、石原都是统制派，可是他们在东亚政策问题上与东条有分歧。真崎、香椎、小畑是皇道派，可是他们都是陆军OB的巨头。现在靠这些人也不行。因此才提出山下、阿南，特别是贺阳宫也推举山下，认为阿南是为数很少的中立派中的一人，山下是皇道派所瞩目的人。

陛下说：“我认为如果不再取得一次战果，整军是非常难的。”近卫公最后说：“如果能取得战果当然很好，可是时间来来得及吗？如果不能在近期实现，半年、一年之后就没什么用了。”

## 控制“停战”上奏

第四个上奏的重臣是若槻礼次郎男爵。1945年2月19日上午10点半，他悠然从容地晋谒了天皇，当时他已是80岁的老人了。

1926年12月，大正天皇驾崩，皇太子践祚，把年号改为“昭和”，那时，若槻年61岁，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在表面上看，他是重臣之中的重臣，他写有《古风庵回忆录》。上奏情况如下：“我从开始就反对战争，战争开始以后，虽然希望战争早日结束，可是我这无业游民，咬牙切齿又有什么用呢？！只好浪迹天涯。”

陛下说：“你既然是重臣，为什么不直接规劝陛下呢？”

“如果能那样做，早就做了，可是不行啊。上奏有关国家政治的建议，必须是有辅佐天皇责任的国务大臣，若有差错，责任都由国务大臣担负，不论是谁，晋谒天皇陈述政治上的见解，这就违背了立宪政治的常规。因此，只是有拜谒的命令，才会来拜谒，不会主动提出晋谒，况且也没有提出申请的理由。小矶内阁时，战争进行的就一直不顺利，我深表忧虑，照这样下去，事态会发展到何种地步？！现在必须竭尽全力，谋求和平，并且和平昭、近卫、冈田商量，要把我们的心里话直言不讳地禀奏陛下，以引起你的注意。

虽然没有提出申请拜谒的理由，可是总觉得这次准许拜谒很顺利。我在这一天问候了天皇。若是往常，只是在大门的笔记本上，写上名字就退出了，可是今天却例外的允许进来。”

“我来到天皇面前，首先讲了对战局的现状深感痛心，并且从开战以来，就很忧虑，如果出现物资匮乏的情况，就更糟糕了。可现在这种情况出现了，我们大多数的运输船，都被敌人的潜水艇击沉了，物资的缺乏比想象得还严重。天皇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这并不是神经过敏。

说到这里，结论只能是本土决战，即使本土决战，也不会扭



转不利的形势。无论如何只有停战，没有别的法子？可是这话只能藏在我心里，万万不能说出来，因为没有说出来，使我感到了万分的惭愧。可是在陛下面前看着他那勃勃雄姿，怎么能直言不讳地说：你服输吧！

我在上奏战争的前途时，担心当局总是以过于乐观的态度向陛下报告。既然如此，我向陛下禀奏道：希望你分别召见政府、陆军和海军，听听他们对前途的真实看法。如果你一起召见他们，容易产生一种群体心理，如果谈悲观的看法，就显得怯懦，因此他们总是说强硬的话。如果有人说了强硬的话，其它人也就都不得不表示强硬。结果你所听到的强硬态度与事实相去甚远。分别召见三者，听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都一致地认为战争前途光明，那就很好了。可是如果三者的看法不一样，那就应该考虑考虑了。我虽然想说必须尽早结束战争，可是没有勇气，战争已经到了非常的境地，我不能下这样重要的结论。

如果能把这些想法都说出来，也许陛下能够接受停战的建议，可是我没这样做。我现在想起来，为自己没有勇气而非常羞耻。虽然平沼、近卫、冈田也都拜见问候天皇，可是近卫与天皇的关系比我更密切，也许更能直言不讳地向天皇进谏。因为事先没有彼此商量，因此，谁也不知道谁在天皇面前说了些什么。当然不会有人说：本土决战就能取得胜利。”

藤田侍从长这一天也侍立一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可以认为若槻男爵在具体的和平方案以及实现和平的时间问题上，也没有给予天皇满意的回答。当然对于一个已退职，没有一个得力情报网的重臣来说，这样要求也许是过分的。”

### 狂轰滥炸的开始

1945年2月19日，若槻礼次郎的上奏结束以后，从下午1点半开始，牧野伸显晋谒天皇，上书奏章。

牧野伯不是重臣，可是他从1921年开始，担任了四年宫内大臣，后来，又担任了十多年的内大臣，是吉田茂的岳父，也是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当时已是83岁的老人了。因为他是较之重臣还要与天皇亲近的人，所以在一系列的重臣拜谒中，他也参加了。当时的内大臣木户幸一，也是维新三杰——木户孝允的孙子，明治精神还在这里默然地存在着。

牧野伯的上奏，从谈海外形势开始，当说到开战之前的和平时期，再多为战争局势做些准备，想些办法就好了。这时不得不中断了，因为下午2点37分发出警戒警报，3分钟后，空袭警报又响了，警笛未尽，一大队B29型飞机，轰鸣着来到东京上空。陛下想继续听下去，可是侍从跑过来催促他躲避，只好退席。爆炸的声音听起来非常近，好象就在身边。

《木户日记》是这样记载这一天的：“牧野伯晋谒天皇，上奏时响起警报，约100架B29型飞机空袭帝都，这次还轰炸了日比谷和银座，损失严重。”可是，这个记载有出入，根据保留在东京都的详细记录，轰炸最严重的是下町。暂且不说，1942年4月18日在多里特尔陆军中校指挥下的妖魔似的轰炸。B29型轰炸机，把沦陷的塞班岛作为基地，进行东京轰炸，开始于1944年11月24日的中岛飞机场轰炸，从此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在这期间，从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轰炸机，也增多了空袭的次数，仅3个月，到2月19日，恰好是第27次轰炸。

轰炸的规模巨大，以重要的军事设施为轰击的目标，而且，发展到狂轰滥炸的地步。这一天，100架飞机，在三多摩上空，分散列成10架编队，在7200米以上的高空呈波状进入帝都。这一天是晴天，刮着和缓的西北风，湿度为30%。

遭难的是王子区半岛的第三、四、五、六、七条街，首先轰炸的目标是这附近的陆军兵工厂。其它的编队，狂轰深川区、赤坂区、葛饰区、江户川区，澁谷区。把490栋，653户，14110坪（一坪相当于3.3平方米）化为了灰烬；驳船12只沉没，100石木头

(一石相当于0.278平方米)被烧毁了。落下来的炸弹，250公斤的120颗，200公斤的34颗，小型电气燃烧弹19,500颗，8公斤的油脂燃烧弹5,280颗，250公斤的黄磷弹10颗。死者163人，伤者223人，受灾者3,803人。这个轰炸编队中约有10架在归途中的京桥区、月岛河岸大街扔下了一颗250公斤的炸弹，在震撼赤坂、青山、皇宫周围的爆炸声中，木户内府可能把落在月岛的那发炮弹，误认为落在了日比谷、银座方面。

顺便提一下，在东京都的记录中，涉及到了官设、私设的消防团的活动。在各企业组成的特设防护团中，大家都不应该逃脱各公司和各工厂的活动。在《邻组防空群》一书中，记载着市民扑火和传递铁水桶的活动，“其中的一部分人逃跑了，而大部分人在防火开始时，有的防止大火蔓延，有的搬运死伤者，有的救护，基本上尽己所能”。国民都在拚命战斗。

大本营在第二天20日下午3点，发表声明“击毁敌机21架，自己爆炸的有4架，遭受创伤的至少30架。”也就是说100架敌机中有半数遭到了我们的打击。当然，这蒙骗不了人，首都人们看到的仅仅是落在四谷区花园町的几个美国兵的尸体和B29型飞机的零件，以及落在小岩驛附近的一架敌机的残骸，完全是战争末期的惨状。

正当牧野上奏的时候，天皇被侍从催促着，象往常一样慢慢地进入了防空壕。因此牧野伯上奏的内容几乎什么也没留下。可是，东京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平民的勇敢斗争和痛苦的呻吟声，要比牧野伯任何忧国的激烈言辞更能打动陛下的心。

过了三天的2月23日，重臣冈田启介海军大将晋謁天皇。这一天没有空袭，东京格外的安静。

### 科学技术运用于军事上

冈田启介海军大将1945年2月23日上午10点晋謁天皇，向天

皇问安、上奏。众所周知，冈田大将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时，担任总理。叛乱军袭击首相官邸时，碰巧在场的松尾大佐被误杀了，他与冈田是干兄弟，年龄相仿，冈田却藏在女佣人的房间里，避免了这场灾难。他承受了这样一场富有戏剧性的命运捉弄，可是这也只是很早以前的故事了。两个月之前，即去年年末的26日，冈田大将的长子贞外茂中佐作为海军军令部幕僚，为了指挥捷号战役飞往吕宋岛，在马尼拉的伊克拉斯飞机场被击落。这时，77岁的冈田大将，也许正为失去爱子，而感到万分的悲痛。如果这样说，同是重臣的阿部信行陆军大将的次子，信弘陆军中尉，1944年10月19日在印度洋尼可巴尔诸岛附近，驾机冲向英国的航空母舰，击沉敌舰，被破格提升二级，当时还没有“特攻队”的称呼，作为先驱，弱冠22岁壮烈战死。在这极端残酷的战争年代，凡是有骨肉血亲的人，都难以避免这样的悲痛。国家正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过于考虑个人恩怨，而不顾国家的安危，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冈田大将现在也是公而忘私地向陛下禀奏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

不可思议的是，冈田大将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这次上奏时的情况只写了三行。在这个回忆录中写道：“陛下在很早以前就决定结束战争了。”因此，大概是故意不写的吧。海军的后代，我们所熟悉的藤田侍从长在后面侍立，却记录了这次上奏的情况。

冈田大将在海军中是典型的记忆力好的人，虽然没有记录，却能把复杂的数字和文件记得很清楚。我认为这是一种天才。冈田大将的上奏从断定战局吃紧，是由于美军科学技术发达和物资丰富开始的。

“敌人大型飞机和舰载飞机大举袭击的结果，使我们难以维持国内的生产力。应该认识到，今后，我们的战斗力会逐渐减弱。从国际形势来看，去年11月斯大林的演说和同盟国巨头会议，日本战斗力减退，是国民对战争的前途满怀不安的时期。相反，苏联却协调了和英美的关系，展开了外交攻势。

支撑着战争的陆、海军，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可能是一样的，过于乐观和天真。国民由于没有准确的判断材料，也抱有一丝乐观的希望。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应尽可能地迅速集结国力，竭尽全力继续进行战争；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想到抓住有利时机，结束战争。不过，这不能轻易泄漏，以免引起思想的混乱。必须认真考虑，安定政局。

为了集结国力，就要打破陈规陋习，首先消除陆、海军之间的隔阂，举个例子来说，陆军和海军使用的飞机，按照需要可以看做是通用的；并且，在政治方面，陆、海军也应该一体化。”

冈田大将和以上重臣一样，用一句抽象的话“伺机终战”，来结束自己的上奏。

陛下迫不及待地问：“正如你所言，我很担心实行起来困难太大，如何集结国力呢？”冈田回答：“的确如此，德国、美国为了把科学技术的精华应用于军事，进行了很大努力，我国在这一点上，做得很不够。民间的技术人员也必须开动脑筋，为陆、海军提供设计方案，陆、海军也应该爽快地接受。”

集结科学技术，在此以前上奏的重臣中，没有人指出这一点。陆军强调精神万能论；与此不同，海军原来断定，现代战争是武器与武器，物质力量与物质力量的较量。他在这里却表现了把精神力量也考虑在内的军事观点。

姑且不谈他自己的儿子已经战死，也许他想向陛下陈述同僚阿部重臣的儿子，驾机冲入敌舰，同归于尽；每天都有年轻的特攻队员出击的报告，等等这些悲壮的事情。